

農業生產合作社介紹

革命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走上新的道路

一九五一年秋天，我們遼寧省綏中縣王宝山子村的六戶互助組員，在中共綏中縣委會派來的同志幫助下，建立起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。社員們推選我当了主任。

初建社的時候，因為沒經驗，走了些彎路，也幹了些糊塗事。我們把土地合起來種，投資按地出，人掙工資，牲口夥餵租用，餘下來再分給土地。社裏養了十幾口豬，借了一間房子磨粉。

那時村裏一部分落後羣眾諷刺我們說：“他們幹不到兩個月，就得打架了。咱們等着看熱鬧吧！”

有些入社的人也遭到家庭的反對。我就遭到老婆的反對。我夜裏開會回家，老婆不給開門，我只得自己拽開。到家吃飯，涼一口熱一口的。張慶書因為入社分了家。他對我說：“這怎麼辦？我看咱們在一堆吃飯吧。這樣出工能齊整。”我錯誤地以為“吃大鍋

飯”是好的，和大家商量後，就實行了。

年底，我到瀋陽參加勞動模範會議。我把社的情況和省首長談了。原中共遼西省委農村工作部負責同志挺關心我們這個新辦的社，就上我們村來了。他幫我們整頓了組織。分紅辦法改成勞力得百分之七十，土地得百分之二十五，公共積累百分之五。公糧和各種開支由社出。

秋後沒有多少農活，社裏一方面準備第二年的生產，一方面搞副業生產，辦了四個月，大家不但沒吵架，還攬了二百車糞，賣了肥豬、粉條，共得三百多元。社買下了騾馬，大家的信心足了。社外羣眾亂嚷嚷，說我們社裏掙下了一千多元。有的說不知掙了多少。經常有人走來看我們的磨粉房，同時好些人要求入社。

一九五二年二月，十三戶新社員加入了進來。這時，一戶土地改革時漏網的富農劉明也混進了社。

社一擴大，各種問題就隨着來了。大家在一堆吃飯，富裕戶主張吃好些，貧困戶主張吃壞些；有的要吃硬飯，有的要吃軟飯。煮飯的說：“一個鍋怎能煮出兩種飯來！”有的人常回家吃，社裏就限制。鬧得大家

不痛快。最後，省委駐村幹部說服我們，才糾正了吃大鍋飯的做法。

在互助組時大家還評過工，可是成社後，社員產生了平均主義思想，說：“還評啥！都一家人了。除了叔叔大爺外，還不都是弟兄嗎！”一部分人主張評，可是多數社員認識不夠，主張不評。只好不評。這樣，男勞力全是十分，女勞力全是五分。

社的勞力、車馬多起來了，有農業，又有副業，都由我一個人派活。起先我把強勞力派去挑糞、犁地，弱勞力留家幹零活和副業活。幾天後，強勞力不滿了：“我們上磨肩膀，下磨腳掌。這樣累的活，却和家裏的人一樣記工。這怎麼算公平！”到後來，幹什麼都是大家一齊去。挑糞時，年輕力壯的心裏有氣，死勁地幹。老头力弱的為了要攆上，也拚命幹。社員劉印，年老體弱，腿上長瘡，挑了一天糞，瘡又犯了，躺了半个月。他老婆跑來找我說：“都說合作社好，能分配合適的活幹。可是，我們現在啥活也得幹。少掙些分沒啥，不能把人累死了！”

到這時，大家才認識到不評工是不合理了。我召集管委會研究後，把勞力分成農業和副業兩個組，給

各人評了底分，每天再按幹得好壞進行活評。評底分時，富農分子劉明最反對。他的勞動不好，想靠過去的办法記老十分。他憑着花言巧語，評上了十分底分，並且騙上了副業組長的職務。

到榜地時，我們將一些活實行了小包工，像榜高粱一畝半計十分工，婦女打棉花園尖五個壠頭計十分工等。劉明這時又反對小包工。他說：“我幹得這麼累，才掙這麼多！”過去扛長活出身的郭有，幹活很積極。劉明就打擊他：“你掙棺材板嗎！”那時我們還沒看出他的破壞本質，只批評了他一下就算了。

人分組，地沒分開，實際上每天還得派活。組長說了不能算數，社員仍舊要我和副主任張慶書開口才動手。

那些日子，我老在想：社怎麼整才對？社要往哪個方向走？夜裏做夢也夢見社裏生產中存在着許多問題。

到苏联參觀學習

三月裏，省委決定讓我參加中國農民代表參觀

团到苏联参观，学习他們的農業先進經驗。社員們和我都樂極了，認為這是我們社的光榮。可是副主任張慶書却發了愁。他說：“你這一去，少則三月兩月，多則半年，社裏的事怎麼辦呢？”我想了想，說：“我這次正是學習苏联老大哥先進經驗去的。不學習不是更沒辦法？我到縣裏一定向縣委要求加強對我們社的領導。以後只要依靠上級和社的積極分子，一定可以克服困難。”

我們中國農民代表，分成五組，在苏联各地參觀了三個多月。我參加的一個組，主要參觀了烏克蘭的集體農莊。我最難忘的要算是坡爾塔瓦省的赫魯曉夫集體農莊了。

這個農莊一共有一千多戶，有七萬七千多畝耕地，三千多畝草原，還有一個三千七百畝的大菜園。我起初一聽，這還了得！這麼大的農莊，怎麼領導管理呢？

農莊主席接待了我們，就給我們作報告。他先說了这个農莊發展的歷史：“同志們看到我們農莊的規模這麼大，可是，我們在一九二四年時，只是一個由七戶貧農組成的共耕社。以後又發展到十一戶。”他

說到這裏，我就想：啊，那不和我們去年建社時一樣嗎！那時我們社也才六戶，多數是貧雇農。今年也才十九戶呀！

他繼續說：“我們的共耕社就跟你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差不多。牲口、農具還是私有的，大夥集體勞動，收入按各戶出的生產資料和勞力分配。那時共耕社計算勞動的方法，不像現在我們這樣，按完成多少工作定額，計多少勞動日，而是按參加勞動的天數計算的。”我一听，这不和我們的“老十分”、“老五分”的辦法一樣嗎！原來蘇聯老大哥也是這麼走過來的呀！

“一九二九年以後，我們成立了集體農莊，名叫‘紅星集體農莊’。後來村裏一共成立了十個農莊，又合併成四個。衛國戰爭以後，四個農莊又合併成現在的一個農莊。”

他介紹了農莊現在的情況，又放映了專門介紹他們農莊的電影，然後陪我們參觀。我們花了幾天工夫，看了農莊的水电站、木工廠、鐵工所、大田、菓園、養馬場、養牛場、養羊場、養豬場、家禽場、油坊、俱樂部、圖書館、托兒所、十年制學校、醫院，和國家在這裏設立的百貨商店、郵局、銀行、消費合作社等等。這

哪裏像一個村莊呀！簡直就是一個小城市。在寬直的道路兩旁，有綠蔥蔥的菓樹林。莊員住宅的紅色和綠色的屋頂，就從樹枝縫裏透出來。學校和俱樂部的高大建築，和城裏的沒什麼兩樣。他們的大俱樂部，比咱們省裏的禮堂還漂亮呢！

到農莊各處看了一遍以後，我們提出了好多感到新奇的問題，比如：土地國有制是怎樣的？實行多勞多得，勞力少的人家怎麼辦？孤兒寡婦和老年人的生活怎麼樣？等等。對我來說，最重要的是了解農莊到底怎樣進行領導管理的。我就提了這個問題。

農莊主席說：“我們要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們。”農莊的許多領導幹部，給我們作了好幾天的報告。我慢慢明確了，原來集體農莊是有一整套科學的管理辦法的。

赫魯曉夫集體農莊根據經營生產的需要，組成八個生產隊。其中五個是農作物生產隊、一個菓園生產隊、一個飼料生產隊、一個建築生產隊。農作物生產隊的人數，隨耕地多少不同。第二隊八十五人，耕地七千多畝；第四隊一百五十五人，耕地一萬一千多畝。隊下面再分小組。

農莊的一切生產經營，都按周密的計劃進行。各隊、各場周密考慮制訂計劃後，還由農莊的農學家、畜牧家、園藝家研究，由相當於我們縣一級的政府機關指導，最後交莊員大會討論通過。

農莊計算勞動的辦法，是按“各盡所能，按勞取酬”的社會主義原則。每個莊員按他在農莊裏勞動的好壞和多少折合成勞動日，秋後按勞動日分配收入。為了計算勞動日報酬，農莊先制訂各種不同工作的工作定額。定額是根據農莊機耕條件、土壤情況、耕畜和農具情況，按照每個忠誠的莊員一天勞動所能達到的數量和質量來訂的。有了定額，再看各種定額工作的輕重、難易、技術、對農莊貢獻的大小，來訂勞動日報酬的多少。

農莊把生產任務交給隊，隊再通過小組長交給每個莊員。工作完成後，隊長驗收莊員的工作，並按定額計算勞動日。各隊全年各種作物的勞動日支出多少，農莊都預先訂好計劃，各生產隊都應按計劃支出勞動日。各隊無故多支出了勞動日（也就是多用了工），農莊不給多記。各隊全年各種作物的產量也預先訂好計劃，並按產量計劃，完成生產任務。如果隊

裏超过計劃(就是超產),按比例加勞動日,另外还把超產的部分提成獎給隊。穀物的提成是百分之二十五,向日葵是百分之三十三,土豆、蔬菜是百分之二十。

不光田間生產規定得這麼科学,連養牛、養豬、養鷄鴨也想出了巧妙的計算勞動日的办法。

比如養牛場,飼養奶牛的莊員,在放牧期間,每擠一百升奶算一點八勞動日;在牛欄期間,每擠一百升奶算三點二勞動日。母牛每生一头小牛,算七個勞動日。小牛生後十五天到二十天中間長得很好,算十二個勞動日。

我們在这个農莊住了十天。我仔仔細細地把每天看到听到的東西都記了下來。回到烏克蘭共和國的首都基輔時,我們住在一個大旅館裏。白天出去參觀,晚上整理集體農莊管理辦法的筆記。

八月間,我們回到莫斯科。社裏給我的來信已經寄到了。信上說,社在省委、縣委關心、領導、幫助下,辦得很好。社裏增選了兩位代理副主任,還從省裏貸來了馬拉農具,莊稼丰收有希望。我看了信,就歡歡喜喜地把筆記整理好,寄給社裏了。

大家接受了按件計酬的办法

九月裏，我們代表團回國。我巴不得馬上回到社裏。到家後，社裏地已耨完，莊稼長得很好，已接近收割了。我參照蘇聯集體農莊的辦法，和社幹部共同研究，訂出收割的計工標準來。比如割高粱，每三百捆計一個勞動日；劈苞米一垧（我們這裏一垧地是十畝）計四個勞動日；割苞米一垧計二點五勞動日等等。

這年，我們超額完成了增產計劃。棉花每畝產二百七十斤，苞米六百三十多斤，高粱三百六十多斤，比互助組和單幹戶高出一倍。每個勞動日分糧近十三斤。貧農社員郭森，以前一年到頭不夠吃，入社後三個勞動力幹了六百一十個勞動日，分糧七千多斤，土地分糧九百多斤，生活變富裕了。

一九五三年春，社由十九戶擴大到四十三戶。

這時，縣委會的同志和我們社幹部一起學習、研究蘇聯集體農莊的經驗，並討論怎樣在社裏實行按件計酬。討論時，社幹部大都思想不通。副主任張慶

書首先表示沒有信心。他說：“苏联的先進經驗好是好，可是人家已經走了三十年了，並且實行了機械化，幹活的數量、質量和我們都不一樣。我們又沒經驗，現在就實行按件計酬，這對我們社的要求太高了。還是實行小包工好。”別的社幹部說：“一天究竟能幹多少，誰也沒準。光我們研究訂出來，社員不同意也行不通。”

我和縣幹部一起，先找張慶書個別研究按件計酬的好處。我說：“現在社擴大了，再用去年的小包工辦法不行了。取酬不合理，必定會窩工。實行按件計酬，我們雖沒經驗，但這辦法合理，早晚是要實行的。我們可以先試一下，老不試就永遠也不能實行。”縣幹部也幫着動員他。後來他同意試驗一下。

管理委員郭森，在我出國時曾代理副主任的職務。他是貧農出身，是個好勞動力。可是他上了富農分子劉明的當。劉明請他吃飯，叫他在會上“放大砲”。郭森在會上說：“定額一定搞不好，質量保不住，活也幹不好。幹莊稼活哪有準！緊幹就多幹點，鬆幹就少幹點，一樣的斤兩拿秤秤還有高低呢，定額怎能訂準！”

我也是貧農出身。我知道他的心事，到晚上就去找他個別談。我告訴他：“共產黨、毛主席領導革命，就是為了咱們勞動人民過幸福日子。土地改革翻身還不夠好，還要更好。這就要靠合作社。將來像蘇聯一樣，集體化、機械化，實行完全按勞取酬。我們靠勞動吃飯的人是應該擁護的。”別的同志也去幫助他，他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在會上檢討說：“我一字不識，上了人家的當。劉明向我說，‘定額是整你們勞力強的，你們能幹，把定額訂得高高的，叫你們死命幹！’其實這是他自己怕少幹活掙不到勞動日。我再不受他的騙了！”

富農分子劉明和商人出身的張廣和，最反對實行按件計酬。劉明不敢公開反對我，就反對副主任張慶書和管理委員張琴書，說按件計酬是他們搞出來算計大家的。

但是，我們不管劉明和張廣和的反对，管理委員會基本上通過試行按件計酬，並且推定我和張慶書、張琴書三人負責起草工作定額標準章程。草底起好，就在管委會討論通過，再開社員大會動員，把定額草底交給社員去討論。

討論時意見很多。勞力強的像郭有、李有等都擁護定額。勞力弱的不同意。有些懶人像劉忠、魏寶山，也不同意。過去常趕車的嫌趕車定額訂高了。常起糞的希望降低起糞定額。也有的說：“把農活一件件分開計工，這是‘分心眼’、‘恢復單幹’。”

經過社幹部說服、教育，說明社擴大，社員多了，如果沒有一套比較完整合理的計工辦法，就會造成嚴重的高工現象。土地是要下勞力才能多打糧食的，如果計工辦法不合理，大家幹活不使勁，怎能多打糧食呢！現在社大了，更有條件進行多種經營，按照各人的體力強弱和技術專長分工。每個社員只要誠實、積極地幹活，就能多掙勞動日。同時，因為定額一般比較低，大家也就接受了。

這一年我們一共制訂了三季六十種農活的定額。定額的報酬分六等，前四等是個人定額，後兩等是集體定額。

一等定額。打棉尖一畝半，或割苞米二畝七等。計零點九勞動日（就是九分）。

二等定額。倒春糞十五車（秋糞十二車），或點種十三畝，或割高粱頭遍一畝六（二遍二畝、三遍四遍

二畝半)等。計一个勞動日(就是十分)。

三等定額。挑糞十五車,或压地二十畝,或起地瓜(紅薯)四分等。計一點一勞動日(就是十一分)。

四等定額。用圓盤耙耙地三十畝。計一點六五勞動日(就是十六分半)。

五等定額。兩人拉土、送糞,按季節和遠近送五車到十六車。共計二點二個勞動日(就是二十二分,趕車的計十二分,裝車的計十分)。

六等定額。三人用馬拉机播種三十畝。共計三點三個勞動日(就是三十三分,每人計十一分)。

我們社起了个新名字

我們學習苏联經驗,制訂了工作定額,又把勞動力編成兩個生產隊,初步實行了責任制。每個隊下面再分兩個小組。編隊是按社員居住條件編的。可是兩隊幹部都鬧本位主義,爭着要好勞力。後來我們管委會把兩隊的勞力站一站隊,強、弱勞力作了平均搭配。這才沒爭論了。編了隊、組,我們再把全社耕地劃成兩個耕作區,固定交給兩個隊負責。根據苏联集体

農莊的計劃管理經驗，我們年初就制訂了全年的生產計劃。以後由我和技術員定期擬訂短期計劃，召開管委會討論確定，交給各隊執行。

因為我們沒有經驗，這年生產隊和耕作區劃分得都不夠合適，又沒有實行臨時調配勞力的辦法，在夏鋤時，一隊高粱苗高，草厚割不過來，二隊苗小不着急割，我們就把兩個隊打亂重編。這樣就沒能很好地貫徹責任制。年初社裏雖然也訂了人畜力使用的大致計劃，但是因為定額不準確，我們也沒把工數包到隊裏去。比如挑糞定額原訂十三車，實際上社員能挑到十五車；拉糞十車，實際上能拉十二車。又因為有的活可以超額，有的活很累，又不能超額（像壓地），我們又只好採用變通辦法，完成了定額就附加勞動日作為獎勵。

第一年試行按件計酬制和責任制，缺點很多，但成績還是很大。首先，隊長、組長工作主動，我和張慶書不再天天派活了。過去光實行小包工，幹活沒計劃，有的社員想把幾天的活一天內幹完，因此疲勞過度，幹一天休息了兩三天。有的社員白天在自己家幹活，早晚到社裏幹活。結果社裏應該當天收割的地

沒收割，第二天下雨又延期了。也有應該摘的棉花沒摘，被風颳落了。

實行按件計酬以前，大部分活是死分活評，實際上評不起來，還是記死分，因此大家不帶勁。比如劉忠、魏寶山等社員，一天挑糞能挑十四、五車，只挑十一、二車。一天犁耩應該是十二畝，劉忠卻只耩六畝，在地頭睡覺。實行按件計酬的辦法以後，他們掙分都少了。到月頭一公佈勞動日賬，劉忠、魏寶山都覺得受不了，說：“我們這麼粗壯的小伙子，掙這麼點分可不像話。”可是他倆人懶，還是不積極幹。劉忠還說調皮話：“分又不能當飯吃！”

為了教育他們，黨支部分工讓我去幫助劉忠。一天我去他家，問他生活怎樣。他說吃的不夠，過去還可以出去賣個工，掙零錢花。我問他：“你認為入社好還是單幹好？”他說：“我也想不出哪个好。”我就把他解放前種人家的地出租出捐的事說了說，再說到今天在社裏只要好好勞動，多掙勞動日就能多分糧食，沒有人再來剝削，決不愁吃的。他沒什麼話說，變了個花樣，說：“我有病，老婆又常和我吵，有時我飯都吃不下。社辦好了我人可垮了。”